

庆祝宁可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

编委会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庆祝宁可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

编委会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庆祝宁可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庆祝宁可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编委会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10

ISBN 978-7-5004-7046-5

I. 庆… II. 庆… III. 中国—古代史—文集 IV. K2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6197 号

责任编辑 郭 媛
责任校对 李小冰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华宝装订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33

字 数 750 千字

定 价 8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2005 年 5 月应邀赴广州讲座



▶ 讲授中国古代史研讨课
(20 世纪 90 年代)



▲ 1988 年 12 月 5 日 60 岁生日在英国国家图书馆书库考察挑选敦煌文书



▲ 1988 年 10 月在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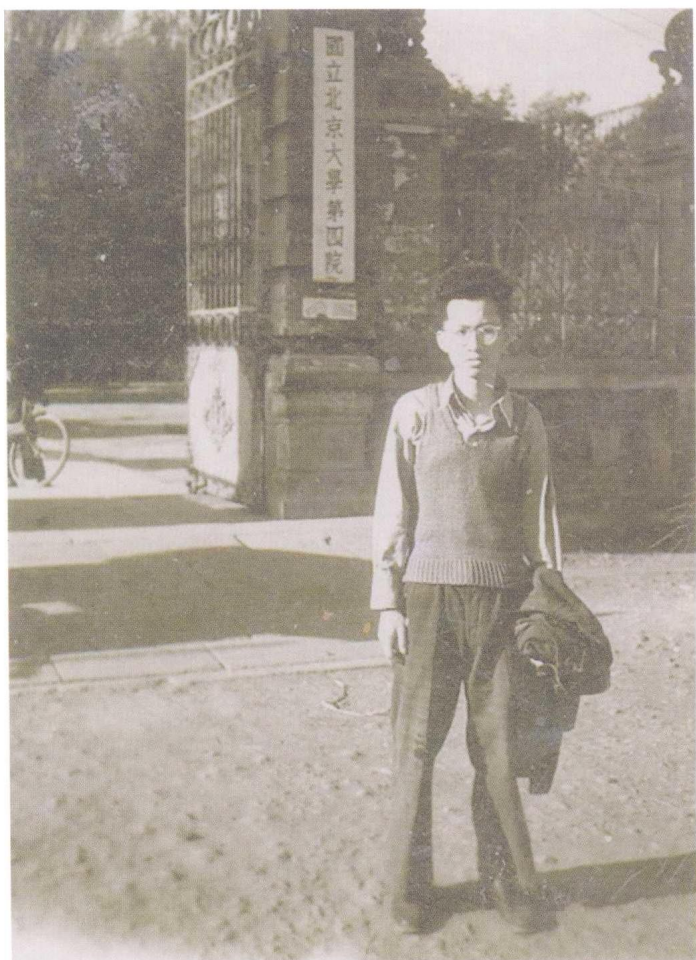
▲ 1985 年兰州敦煌学会讨论会(左二为宁可先生)



▲ 1981 年在敦煌(右起)宁可、宿白、齐陈骏、樊锦诗等



▲ “文革”期间与汤一介、吴增祺合影



◀ 北大四院大门 国会街当时为史学系一年级(1948)

本书编委会

编 委 郝春文(召集人) 李华瑞 任士英
宋 杰 魏明孔 郭 媛
许福谦

秘 书 刘 屹

2008年12月5日是著名历史学家、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宁可先生八十岁生日。宁可先生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科的创建者之一。早在1953年，首都师范大学的前身北京师范学院创建之初，先生就参与了历史系的筹建工作。最初参与筹建工作的只有戚国淦先生（组长）、成庆华先生和宁可先生三位，他们三位在组建教师队伍、开设课程等方面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开创性工作，为以后历史系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有筚路蓝缕之功。50多年来，先生虽曾担任历史系党总支第一副书记、系代主任、副主任等党政领导职务，但始终作为一线教师坚持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都曾作出过突出贡献。在学科建设方面，先生创建了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等三个二级学科；在人才培养方面，先生培养了一批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很多人都已成为高等学校和研究单位的学术骨干。“饮水不忘掘井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能有今天，与宁可先生等老一辈创建者长期勤奋努力的工作密不可分。

宁可先生学术兴趣广泛。自1946年发表第一篇学术文章至今，60多年来他先后出版《宁可史学论集》、《史学理论研讨讲义》、《敦煌社邑文书辑校》（合作）、《敦煌的历史与文化》（合作）等论著，主编和参加主编《中国经济发展史》、《隋唐五代经济史》、《中华五千年纪事本末》、《中华文化通志·地域文化典》、《敦煌学大辞典》、《英藏敦煌文献（汉文非佛经部分）》等著作，在《历史研究》、《红旗》、《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论文80余篇，涉及历史学、中国古代文学和天文学史等学术领域。仅就史学而言，曾在史学理论、中国古代经济史、敦煌学和隋唐五代史等学术领域发表过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

在长期的教书育人和学术生涯中，宁可先生以其渊博的学识、超凡的悟性、开阔的理论视野、高度的宏观概括能力、前瞻性的学术意识和严谨扎实的学风赢得了海内外学人的尊重。更以其诲人不倦的师德和虚怀若谷、平易近人的处世态度得到受业弟子的爱戴。先生虽已年届八十，而道体康健，为学不辍。诸弟子坐沐春风，欢欣无限，

2 庆祝宁可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

纷纷建议遵从海内外惯例，邀请先生的友人和弟子各就其治学领域撰写论文，汇集成册，为先生寿，兼庆贺先生从事学术活动62年、从教55年。众人推举我和郭媛、李华瑞、任士英、宋杰、魏明孔、许福谦等组成编委会，由我主持其事；刘屹为秘书，负责收发和联络等具体事务；编务工作则由郭媛负责。“庆寿文集”的编辑工作得到了相关人士的大力支持，我们共收到学术论文和文章40多篇。为了展示先生的学术贡献，我们还组织了五篇分别介绍先生在史学理论、中国古代经济史、敦煌学、隋唐五代史和考察史学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的文章。

最后，谨代表编委会衷心感谢为“庆寿文集”提供论文和文章的撰稿人；衷心感谢所有提供过帮助和支持、关心此事的朋友；衷心祝愿宁可师健康长寿，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2008年7月25日郝春文谨识于首都师范大学寓所

宁可先生小传

宁可，男，湖南浏阳人，1928年生。中国共产党党员。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1948年参加革命工作。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中国唐史学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文史杂志顾问。

从1949年2月到1952年7月在北京市第三区（东四区）人民政府和教育局从事了五年教育行政和编辑工作。1953年调入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历史教研组。1954年转入北京师范学院（后改为首都师范大学），先后担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曾兼任图书馆副主任和系总支第一副书记，代理系主任、副系主任等党政工作、学报副总编辑。从事中国古代经济史、隋唐五代史、敦煌学、史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曾被推选为北京市史学会理事、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唐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副会长兼秘书长。

主要论著：《宁可史学论集》、《史学理论研讨讲义》、《敦煌社邑文书辑校》（合作）、《敦煌的历史与文化》（合作），主编和参加主编《中国经济发展史》、《隋唐五代经济史》、《中华五千年纪事本末》、《中华文化通志》、《敦煌学大辞典》、《英藏敦煌文献（汉文非佛经部分）》等。先后在《历史研究》、《红旗》、《新建设》、《中国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论文80余篇。

目 录

序	郝春文 (1)
宁可先生小传	(1)
宁可先生与史学理论	邹兆辰 (1)
宁可先生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	阎守诚 (5)
宁可先生与敦煌学	郝春文 (16)
宁可先生的隋唐五代史研究	孟彦弘 (21)
访古考察花絮	胡 戟 (25)
从“封建”含义谈中国历史分期的多元视角	张国刚 (29)
从孔子“属辞比事”至刘知几“明镜照物”:一个实录史学观念 的比较	雷家骥 (35)
儒家公羊学派夷夏观及其影响	陈其泰 (49)
《资治通鉴》史料史论转引李注裴注考	孙文泱 (56)
后现代方法在中国史领域的适用性	邓京力 马 敬 (80)
历史文献学思想研究论纲	陈晓华 (91)
胡塞尔:禅法再发现	高小斯 (99)
略论中国古代对官吏经济政绩的审计考核	方宝璋 (113)
先秦至秦汉官工业管理的发展和变革	张桂萍 (121)
《老子》中的“和”字释义	熊德基 (135)
董仲舒的天人关系、阴阳五行说与“原始思维”	杨生民 (138)
汉唐樗蒲戏研究	王永平 (147)
合肥与曹魏的御吴战争	宋 杰 (165)
吴简所见长沙的市场	蒋福亚 (182)
五斗米道传入江东的几个问题	刘 屹 (195)

室韦源于鲜卑说新论	高凯军 (208)
唐代过所的“副白”、“录白”及过所的“改请”	
——关于唐代过所的一个侧面	孟彦弘 (218)
吐鲁番文书所见唐代杂徭(上篇)	
——唐代西州杂徭研究之二	程喜霖 (227)
唐西州的封爵制度	李 方 (244)
吐鲁番出土唐写本《褚先生百玉碑》残卷小考	邓文宽 (262)
《沙州僧民上吐蕃赞普奏稿》(又本)	
——敦煌遗书中一件为閼朝修和请功的奏表	李正宇 (266)
沙州归义军史事系年	
——(咸通七年——十三年)	荣新江 余 欣 (271)
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所见兵器陌刀考	郑炳林 (295)
《中国书店藏敦煌文献》观后感	柴剑虹 (303)
略论唐朝的州县行纲	陈明光 (309)
唐代“庶士”研究	黄正建 (319)
唐代吐蕃手工业经济述论	魏明孔 (335)
贺兰敏之烝于荣国夫人辨	赵和平 (345)
也谈中晚唐五代别头试与子弟之争	金滢坤 (350)
正仓院藏西方风格玻璃器试探	王义康 (369)
福建开闽王源流考	张海瀛 (385)
辽金元时期北京地区战争频发的原因及特点	郝志群 (392)
北宋理学四子的教学之道	
——《近思录》研究之一	姜锡东 (400)
文天祥与南宋末年宰执之关系考	李华瑞 (418)
朱棣实行北边防线南撤政策的后果	田培栋 (432)
京西皇姑寺历史渊源与沿革考	苗天娥 (448)
浅论谢榛	
——兼论晚明的山人	商 传 (465)
清光绪石印本《黔南苗蛮图说》之“苗蛮”种类研究	李德龙 (475)
唐代经济史研究的简略回顾	刘玉峰 (487)
中国历史教材近代化概述	马执斌 (498)
中国警学研究的本土化进程:近十年警史研究成果举要	任士英 (503)
宁可教授论著目录	(514)

宁可先生与史学理论

邹兆辰

宁可先生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有着深厚的理论素养，他研读过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参与过很多历史理论问题的研讨；因此，他善于从理论的视角把握历史的现象和本质，从宏观的视野来分析历史事物的因果关系。无论是听他讲课还是阅读他的论著，你都会感到一种深邃的洞察力和理论的穿透力。从上世纪 50 年代参加历史教学工作以来，他就一直非常关注历史理论方面的问题，积极投入史学理论学科的建设，并在这些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学术界关注的历史理论问题中，农民战争是一个热点问题，宁可先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参与讨论。对于历史上的农民政权问题，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农民革命的主要目标是夺取政权，农民是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其次，农民能够建立代表自己利益的农民政权，即建立农民的专政，尽管它是不巩固、不完全的短期专政；第三，农民由于阶级与历史的限制，不可能巩固与长久地保持自己的政权，农民政权的消灭或变质是农民革命失败的主要标志。当时，学术界有人否定农民有建立自己政权的可能性，认为不存在建立一个“农民政权”的经济基础；有人认为，由于农民的小私有者地位，他们的起义只能是自发的，不可能建立政权。宁可先生认为，固然农民是不能巩固与长久地保持农民政权的，因为农民不能改变社会制度，在经济上解放自己；再由于他们本身的落后、保守、狭隘、缺乏组织性和纪律性，农民政权是不能巩固和长久保持的，但不等于说农民战争不能建立起短期的农民政权。

在“文化大革命”前，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是否带有皇权主义性质，也是争论的一个热点。当时一种意见认为，农民经济分散落后，他们不了解封建制度及其上层建筑，不理解皇帝是什么角色，他们需要专制皇帝来代表他们；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农民战争并没有表现出皇权主义性质，中国农民不仅反对地主，也反对封建皇帝，不能因为农民起义名义上称王称帝，就把他们当成皇权主义者。宁可先生认为，应当承认农民有皇权主义思想，中国农民战争带有皇权主义性质。但是，它和地主阶级的皇权主义有本质的区别，并且不是农民思想和农民战争性质的主要方面。他认为皇权

主义是一种普遍现象，这是农民的阶级地位与历史地位决定的。农民的经济地位使他们很难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阶级，必须有一个权威来代表他们；同时，农民的阶级和历史局限，使他们不能创造出一个符合自己需要的政权形式来。

宁可先生还对农民战争的自发性与觉悟性的问题发表过意见。他指出，我们应该承认，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是自发的革命而不是自觉的革命，但这不等于说在农民的自发的斗争中不存在某种程度的觉悟性，也不等于说两千年间农民斗争的觉悟性没有任何增长。如果只强调农民战争的自发性，连农民在斗争中表现的某种觉悟性和这种觉悟性的逐步增长也一并否定，那就走向贬低农民革命性的一面了。

在关于“让步政策”的讨论中，宁可先生不赞成简单地用“让步政策”来概括当时的历史现象。当时有些同志对农民战争后封建王朝的政策做了不适当的估计，他们把封建王朝的政策的内容简单地归结为对农民的“让步”，同时又常常过分扩大这种所谓对农民“让步政策”的适用范围，过高地估计了它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宁可先生认为，这样的表述容易导致把复杂的历史过程简单化，忽略各次农民革命的特点和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忽视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的直接推动作用。

20世纪60年代初，宁可先生还积极投入了关于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大讨论，成为讨论中的核心人物。当时学术界对于什么是历史主义、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之间是什么关系，在认识上有分歧。1963年，林甘泉在《新建设》上发表文章，批评翦伯赞对历史主义观点的认识，强调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统一体，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浸透了历史主义的精神，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是完全一致的、统一的。宁可先生应《历史研究》主编黎澍同志之约，在《历史研究》上以《论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为题发表文章，针对林甘泉文章的观点，指出阶级观点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核心，历史主义是辩证法对历史过程的理解。把阶级观点同历史主义的统一看做是内容完全一致的，把它们之间的联系看做是必然的，只要有了阶级观点自然就有了历史主义，不免是一种机械的、简单化的理解。文章发表以后反响很大，但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于是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没过多久，林甘泉写了第二篇文章，强调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作为唯物史观统一的观点和方法，有着不容分割的内在必然联系。宁可先生也写了关于历史主义的第二篇文章《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1964年在《历史研究》发表。他指出，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这两个概念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历史主义侧重的是从发展的角度看问题，阶级观点侧重根据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的规律对所研究的对象作出科学的解释。二者的统一是有条件的。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是从不同角度认识统一的历史过程的两个原则或方法。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术讨论受到了政治运动的影响，翦伯赞、黎澍等先后受到批判，宁可先生也跟着挨了批。

“文革”以后宁可先生一直关注着历史学的理论建设。1984年他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什么是历史科学理论？》的文章，受到史学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历史科学理论问题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大家都希望史学理论能够成为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但是对于这门学科建设中的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还不是搞

得很清楚。宁可先生把当时史学理论方面涉及的内容概括为六大方面：一是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理或规律的探讨；二是关于客观历史发展的辩证法问题；三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或规律在特定时代、地区、民族和社会现象领域的具体化；四是历史学本身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如历史学的对象、任务、特点、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历史认识的特点、历史学的层次与结构、历史学的方法等；五是史学史和当代各种史学思潮、流派、观点的研究和评论；六是对当前历史研究倾向的研究与评论。他指出：从广泛的意义上说，这些问题都应该属于历史科学理论的研究对象；但是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历史科学理论应该有自己专门的概念、范畴、原理和规律，并且构成一个严整的科学体系，那么只有上述六个方面的第四个方面，也就是只有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和方法问题才属于历史科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就是说，应该把历史科学理论分为有关客观历史的理论和有关史学本身的理论这两部分。

2004年，他在《河北学刊》上发表《什么是历史？》一文，这是对历史科学理论建设的进一步探讨。他认为“历史”这个概念应该包括三种意思：一是指人类社会过去的发展过程，也就是所谓“过去的事”；二是指对过去的事的记载；三是人们意识中的过去，或者说就是人的历史认识。过去人们往往注意到“历史”一词的前面两层的意思，而不太注意第三层的涵义。以历史为认识对象所形成的一门学问，就是史学或历史学、历史科学，它是一种知识体系。我们的历史认识可以有四个层次，就是历史意识、历史知识、历史学、历史科学。历史科学就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历史学，它的任务是求真，就是把我们的历史认识与真实客观的历史一致起来。“史学理论”不单单是历史学，而是“史学学”，它就如同“科学学”一样，它是历史认识论。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宁可先生除了探讨什么是历史科学理论的问题之外，还实际研究了一些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问题。如《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地理环境》、《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问题》、《中国历史上的皇权和忠君观念》（合撰）等文章，就应该属于广泛意义上的历史科学理论问题；而《从事实出发是历史认识的规律》、《充分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等文章，便属于严格意义的历史理论。其中，《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1986年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是建国以后的30年间被完全冷落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具有人类社会的发展究竟由哪些因素决定的理论意义，而且还具有涉及经济、政治、军事乃至文化的发展和决策的现实意义。此外，他还在《平准学刊》上撰文，专门论述了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地理环境问题。

2005年鹭江出版社出版了宁可先生的《史学理论研讨讲义》，这是他多年来为研究生讲授史学理论课程基本内容的结晶。在这部书中，他不仅讲了历史本体论，就是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看要注意客观历史的哪些方面，而且着重讲了历史认识论，就是讲怎样认识历史。他强调，人类社会可以包括一个一个的个人，也可以包括人类社会的整体。这其中还有群、区、面、层、结构等等。这里面，人、群、区、面、层等在人类社会各自占有自己的地位，又形成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这就形成各色各样的社会结构以至一

个社会的整体结构。历史就是这些极为复杂的关系的相互作用的产物。这样看来，那些相距千万里，时隔千百年，看来毫不相干的东西，也会在各种环节和中介的作用下发生若干联系。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个别的历史事物、历史现象和历史活动具有一种比它们直接表现出来的效应更深远、更复杂的关系和效应。

他还认为，只要不限于简单陈述一些事件和人物的活动，而是去认真探讨它们产生的原因，那我们就会感到历史的脉搏在深沉的地方的规律性的跳动，而探寻那些表层之下的深沉的东西，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生活、愿望，不同地位、不同利益的民族、阶级、阶层和集团，社会的结构、各部分的关系和它的运动，也就是那些较深和更深层次的东西，我们就会发现，那些表层的东西，无非是无数偶然性集合下的深层次的东西、规律性的东西的一种表现。比如说吃饭，这是属于基础性的东西，饮食结构的变化所形成的历史效应，看起来是不大的，也是不明显的，但决不是不重要的。而且，它还会引起其他深层的、浅层的一系列变化，进而形成一种明显的、甚至巨大的历史效应。地理大发现以后，美洲传到欧洲的重要作物如土豆、玉米、红薯、烟草、可可、花生、番茄等作物对欧洲人的生活产生了影响。玉米和红薯在中国的作用也是明显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任何一个历史活动都不是孤立的，它是由许多过去的和当时的历史因素、历史条件综合起来的结果。而一个历史活动的作用、效应影响，又是许多个人、群体、层面等因素以及历史条件的相互作用的结果。这就告诉我们，不要孤立静止地看待历史，而要从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运动的角度来把握历史。历史的效应，也就是历史作用，它可以有不同的情况。有的是正效应，有的是负效应；有的是直接效应，有的是间接效应；有的是长期效应，有的是短期效应。而且，这些效应可能是不一致的，因时因地的不同，会有不同结果。

宁可先生在《史学理论研讨讲义》中特别强调，历史认识就是从掌握个别的、具体的历史事实开始，经过对历史经验的概括、总结，最后上升为规律和理论。这就是事实—经验—规律的过程，最后是历史过程规律化的再现，是历史认识的四个互相承续的阶段，也就是毛泽东说的“实事求是”的过程。现在，史学界受后现代主义影响，有的人不承认有基本的历史事实存在，强调历史是个人的解释。宁可先生不赞成这种观点，他认为历史科学的目的还是要探讨真实的历史事实。

宁可先生关于史学理论方面的一系列观点是随着建国以来历史学所处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学术环境的变迁而不断发展的，他在“文革”前的一些理论文章必然会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但是，他在历史研究中特别重视理论的作用，以及在理论上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精神，一直受到史学界同仁的敬佩。他对史学理论体系的不断深入探讨，他对历史本身的深邃思考和见解，他对认识历史的理论与方法方面的一系列精辟观点，对于当代史学理论学科的建设，仍然具有现实的意义。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